

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的殖民主义、 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问题

[美] 顾德曼

“我国认真古怪精灵，会做东西洋未作之事。”
—俞寰澄，《民元来我国之证券交易》 1947¹

1921年下半年，在上海大约有136至150家股票交易所开张营业。满怀对现代性和经济繁荣前景的空前热情，上海市民在一个城市里建立起了大量股票交易所，并投资于这些交易所；其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已有的交易所，我甚至敢断言，也超出了当今世界现有的交易所。²到1922年初，除了个别例外，上海的股票交易所几乎都崩溃了。也许陈独秀关于这个城市被“纽约拜金主义的铜臭”完全腐化的论断可以解释这次上海股票市场泡沫，但这些交易所的产生，其特征和与之相关的普遍理解还是值得进一步分析。³

为数不多的有关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的学术研究多强调其经济史意义。尽管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把上海早期的证券交易所看作是近代资本主义金融“萌芽”时期的象征，⁴但他们基本上将这一段上海历史理解为经济不成熟。⁵一些参照经济学常规来解释上海交易所的运作或者说功能失调的尝试倾向于把现代化者的渴望和中国人的机构说成是对西方模式的拙劣模仿，正如那些把欧洲的机构与理性联系起来的现代性假说一样。我更愿意考察政治因素——城市中多重的、限制性的和政治上不平等的司法权运用（换言之，半殖民地框架结构）和民族主义——塑造中国对于大众化市场资本主义的早期经历的方式。我的叙述侧重于上海“交往区”（contact zone）的特殊性，它是这样一个区域，在这里，中外居民及其权威机

¹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上海，1947），第142页。

² 股票交易所的数量只是交易所热潮的一个侧面。在这次风暴中，上海股票交易市场的资金总额比该市中外银行的资金总额多两倍多。1921年11月根据一份上海英国商会的报告，当时中外银行的资金总额为7500万元，而交易所的数字是1亿多元。Public Record Office, FO 228/3175。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Sokolsky）提供的数字是98家交易所资金数为169,000,000元，在1921年12月初为140家交易所2亿资金。《物品交易所的赌博》，《华北每日新闻》，1921年12月6日。刘志英的数据为资金148,500,000元加上1千万美元投资在股票市场，8百万元投资在信托公司。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第19页。

³ 《三论上海社会》，1920年11月1日，重印于《独秀文存》（芜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595页。

⁴ 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第1页。

⁵ 究其本身，这些研究假设了一个标准化市场发展的逻辑，而这只是到近来才在经济领域起主导作用。朱荫贵：《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月；A. 麦克爱德里（A. McElderry）：《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所的过去和现在》，2001年1月，昆士兰大学，亚洲商业史研究中心；W. A. 托马斯（W.A. Thomas）：《中国西方式的资本主义》，2001年；冯子明：《民元来之交易所》，朱斯煌，《民国经济史》，第146页；M. C. 伯杰（M.C. Bergere）：《中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关于标准经济概念长期的争论，看P. 科恩（P. Cohen）：《在经济发展中，一个对基本假设争论的愿望》，2007年7月11日。

构都深受不平等的相互接触关系的影响。1921年在上海兴起的中国股票市场，就其令人惊奇的投机特色而言，一些精明的占用—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化的西方股票市场的占用，而是一个现实的、以投机为突出特征并在上海进行经营的欧美人股票市场和—一个刚刚在同一城市开张的日本人股票交易所的占用。但是除了包含在刺激它们的投资热中的赢利动机外，催生并推动1920—1921年上海股票市场发展的主要不是市场因素，而是政治，民族主义修辞学的和忧虑的策略。股票市场的推动者隐瞒了下列事实，即中国的交易所并非纯粹是中国人的，而在上海这个各种势力混杂的地方，资金流动也难以得到有效监控，保证其民族单纯性。正是民族主义和以民族为导向的历史编纂的极端化词语模糊了人们对复杂的身份认同、混合的机构和遍布全城的跨国资金流动及其关系网的认识。最后，我的叙述试图阐明本土文化对资本主义和股票交易所的理解，而这一理解是不能被简约为殖民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但它对于半殖民地接触的独特性来说却是根本的。⁶

这篇论文呈现出了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第一部分是对那些导致如此众多的上海交易所建立的事件和关键人物所作的概括介绍。这个介绍为后面的部分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而后者则集中探讨围绕着这些新经济形式产生的意识形态观点。第二部分介绍了民族主义的分支，帝国主义和城市的半殖民地结构—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借以为股票交易所发展提供合法性证明和针对中国资本的民族单纯性而制造忧患意识的方式。第三部分介绍了在经济泡沫时期以及市场崩塌后出现于上海报刊的有关经济问题的大众讨论和分析以及从这些讨论和分析中产生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窘境，既根据民族主义又根据旧话语关联。“经济”这个词是中国在19世纪从日本引进的，它是由日本人基于中国经典词语“经世济民”而创造的，而西方经济学家很难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古典词汇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和道德性意义。股票市场的崩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危机，特别是在中国人的道德方面。他们的道德被牟利的欲望所玷污，而这也是造成这场经济灾难的重要原因。

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简史

1920—1921年上海中国人交易所的形成是由下列诸因素促成的，即上海经济的发展、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的存在以及民族主义者幻想与实际的革命经费需求的综合。要讲述这段历史，有必要把上海历史中通常被分别开来的几个组成部分综合起来：一是聚焦于现代化的关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描述，一是与孙中山的财政考虑和蒋介石及其合伙人的投机热望相关的非官方历史，一是关于该城市的外国机构和权威机关的地方史。

尽管正式的中国人股票交易所直到1920年才建立，但各种各样的证券交易场所已经在19世纪末出现于上海。朱荫贵描述了1880年代的中国股票市场，讲述了一个短命的、专门从事股票交易的中国人公司在1882年的发展情况；这个公司在1883年就被一次投机危机打垮。⁷此后，中国的证券—主要是企业股票—大都非

⁶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在1920年代的上海其半殖民地化冲击的特点：多重的帝国主义和外来的现代化模式；上海独特的外国租界及相关机构（这显示了由赋有治外法权的多样的外国势力所造成的社会政治环境）；旧式的本地价值观和文化观与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概念的相互作用。

⁷ 朱荫贵：《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也可见《上海品君（音译）股票公司蓄积章程》，《申报》，1882年9月27日，28日。

正式地在“茶会”(teahouse meetings)进行交易。⁸1907年时,一些上海商人曾向政府提议按照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模式创建一个中国股票交易所,⁹但商人社团并没有在这个计划下团结起来,而计划本身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非正式的中国人股票交易逐渐集中到1914年开业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Shanghai Stock and Bonds Trading Association)了;大约有20个证券在该公会挂牌交易。个别商业行会(例如面粉和黄金)也建立起了类似的股票交易场所;在这些场所中,人们制定了详细的有价证券买卖规则。¹⁰由于上述交易场所只限于少数商业行会,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多数上海投资者主要是在同时期具有高回报率的外资股票交易中了解这个市场的。

上海外资股票市场是随着(1898年)股票和证券经纪人公会和190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出现而形成的。与其他的上海外国社团一样,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不仅仅适应于某个单一国家的需要,它所执行的相关规则也是以几个欧美模式为基础的(包括伦敦及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它的纪律从一开始就非常松懈,其交易记录也很不精确,投机倾向的交易随处可见(简言之,它具有腐败、人为操纵、变化无常及规则缺失等等所谓“不成熟市场”所共有的特征)。正如W. A. 托马斯(W. A. Thomas)在他新著的有关上海西方人股票市场的研究中所提及的,在大部分国家,股票市场主要为了筹措资金、解决国家财政赤字而建立的,而在上海,投机则成为其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促进因素。公司的主管们不会制止利用企业内部消息来“卖空”他们自己公司股票的行为。这个投机市场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投资者。这些投资交易虽然没有深触中国社会,但中国的买办和在外国公司工作的职员通过倒卖外国股票为外资运输及其他商业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在怡和(Jardine)、旗昌(Russell)和其他大公司1860年代就形成的中外合资企业中,中国的资金占总资本的40%强。尽管中国的资金属于全部股票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上海证券交易所直到1929年才接纳中国企业成为其成员。¹¹

对于外国股票市场的投资也揭示了世界经济的趋势。1910年,英国和美国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为橡胶市场创造了巨大的发展前景,东南亚的橡胶种植业随之兴盛了起来。许多橡胶公司在上海大做广告,上海的中外投资者也狂热地予以回应。据报道,在上海买卖的橡胶股票有70—80%属于中国人,特别是浙江商人。在全球经济的低迷中,中国人的投资损失惨重,而当地半殖民地架构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损失。随着橡胶泡沫的破灭,那些破产的上海股票交易所经纪人与那些强大的外国银行及其他外国金融机构一起制定了一个复杂的解决方案。但中国本土的银行,由于资金有限,却深受打击。很多中国银行因为外国银行撤资而破产。

¹²

⁸ 在特别的茶室中进行茶会这样的特殊交易一天两次,一次在早晨一次在晚上。冯子明,《民元来之交易所》,第146页。

⁹ 东京株式取引所于1878年开始营业。

¹⁰ 《上海交易所》,《中国经济周刊》,(北京:中国政府经济信息局),1933年1月,第43—44页;冯子明,《民元来之交易所》,第147页。

¹¹ W. A. 托马斯:《中国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第71、78、86—89、90、103、112页。因为中国的资金投资到外国公司是不被中国道台承认的。因此这样的这样的投资对与中国股份持有者更危险。

¹² 在中国商团要求阻止国家金融危机的压力下,上海道台赴外国商会商洽,并从外国银行得到一笔低息贷款以保护上海贸易帮助减轻中国金融机构未来的危机。朱荫贵:《近代上海证券市场》,

在目睹了中国人金融机构在上海橡胶危机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¹³和中国人被排除在西方人股票交易活动之外的事实之后，各种各样的中国商人、政治改革家和革命家遂呼吁立即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股票交易所，并把建立股票交易所看作是实现本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正如在看到英国人和日本人设立于中国的商会的运作之后极力劝说清政府建立本国的商会一样，世纪之交之际，中国商人和政治幻想家为争取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股票交易也在清王朝的末年开展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梁启超早在 1910 年就撰文赞扬股份公司形式远胜于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式和合伙式商业组织，大力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股票交易所，并把这一举措评价为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¹⁴1914 年，北京政府极力让人相信股票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颁布了第一部股票交易法，为中国人注册股票交易所、制定相应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于股票交易所究竟应当官商合营还是由商人自己经营的问题争论颇大。¹⁵

但是接下来，左右上海股票市场风云变化的，既不是某个商人也不是北京政府的某个官员。刺激上海第一批中国人股票交易所在新法规下出现的因素，并非来自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需要和一项筹资计划。1916 年末，由于缺乏革命活动资金，孙中山请求浙江运输业大亨和上海商人虞洽卿帮助实现一个股票交易计划；此前孙就有一种包括发行革命公债在内的财政革新计划。¹⁶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个详细的、准备向中国财政部提交的在上海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的申请报告。¹⁷杨天石在其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详细论述了早期股票交易所的复杂情况；他的论文为早期的国民党口述史学增加了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在这一活动中，孙中山一直与一名日本合伙人有密切联系。这个日本人就是神户的一位被描绘为“中国革命的支持者”的运输业大亨，他想创办一家中日合作的交易所并通过提供资金从而获利。¹⁸

1917 年 1 月，孙、虞、张、戴等四人赴京向政府提出了建立股票交易所的申请。他们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观点出发阐述了他们的理由。他们认为，为了规范商品价格、促进资金流动、监管股票经纪人、为新企业吸引投资和预防经济恐慌，

第 62—65 页；W. A. 托马斯：《中国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第 153 页，162 页。上海人民银行上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年，1978 年再版），第 74—78 页。

¹³ 在十年后俞寰澄对相关事件的账目统计上看，很明显中国人在橡胶热潮中的损失是由于“狡猾的外国人”造成的，他们利用中国人的损失赚取了大量金钱。俞寰澄：《民元来我国之证券交易》，朱斯煌，《民国经济史》，（上海，1947 年），第 141 页。

¹⁴ 《警告国中谈实业者》，《国风报》，1910 年 11 月 2 日，重订于《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 265-273 页。

¹⁵ 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第 6 页。

¹⁶ 玛丽-克莱尔·比尔律（Marie-Claire Bergère）：《孙中山》，第 191 页。

¹⁷ 《上海交易所》，第 43 页。

¹⁸ 日本的合伙人被认为是三上丰夷。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名字（也许是代替三井），尽管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在账目上。根据杨的观点，戴季陶在 12 月 5 日与三上丰夷的代表并签署了一个合同，固定了该交易所的基本金为 500 万银元。因为中国一方缺乏资金，日本人同意半数资金的有息贷款，要求返还该所利润的 80%。有关该所雇用日本顾问的协议也被签署。孙中山、戴季陶、张静江及虞洽卿都在协议上签字。杨天石：《蒋中正先生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近代中国》，第 139 期，2000 年 10 月，第 158 页。

作为中国商业、金融和工业中心的上海需要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他们还认，如果不建立股票交易所“大宗物产之价格，一二外国经纪人常得自由操纵之，病商病国，莫此为甚。至于有价证券之交易，亦无一中心之机关，已发行之公司股票不能流通，新发生之公司不易招股，已发行之公债价格日见低落，将来国家或地方发行公债更难于办理。因此之故，中国公司多于外国政府注册，以图其股票可以赖外国交易所而流通，中国之投资者亦多弃本国公债于不顾，而乐购外国之公债……”。¹⁹这份充满民族主义者声调的申请书并没有提及到日本人的参与。这段时间里，戴季陶只身一人赴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建立了一个筹备性办公机构。

这个计划在施行中遇到了许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困难。1918年春天，正当戴季陶忙于筹备工作时，旅居上海的日本人在公共租界中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股票交易所——商业取引所，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交易所的出现使虞洽卿感到了竞争压力并促使他进一步劝说北京政府同意在上海建立一家中国人股票交易所。²⁰上海的请愿者断言日本交易所将会对中国投资者采取歧视态度，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抵制日本人对市场的操控。²¹

正当中国的组织者与农商部就刚刚被批准成立的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定义和规模进行谈判磋商之际，²²获利颇丰的日资商业取引所受到了由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反日情绪的折磨。1919年底，虞洽卿在一个曾经遭遇日本人经济渗透的地方，具有象征意义地发起了攻击。他买断了商业取引所占据的地段（两亩左右的不动产，位于爱德华大街和四川路的交叉处）并发出通告，要求它马上搬离。²³

在这个地方，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迅速建立起来并于1920年6月获准开张营业。据说，他宣称他的目的是与“日本三井商团1916年建立的”日本企业进行竞争，从而赢得了反日积极分子的支持。²⁴

然而，第二家中国人交易所的创办很快就使局势复杂化了。该交易所与虞的交易所展开了竞争，并证明了中国法律在派系政治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一场发生在上海股票公会内部的争论导致中国政府批准在上海设立两家股票交易所。虞试图吸收原有的上海股票和债券交易公会的成员共同行动，但是被回绝了。与之相反，上海股票和债券交易公会在1921年初成功地成立了它自己的竞争性康

¹⁹ 杨天石：《蒋中正先生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近代中国》，第139期，2000年10月，第159页。

²⁰ 第一个主要经营政府债券的中国交易所1918年创立于北京。是由日本人在上海建立交易所事宜引发竞争的一种表现。《取引所与交易所之争逐》，《申报》，1918年12月17日。

²¹ 朱振陆：《证券物品交易所简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资料委员会：《旧上海的交易所》，（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4年），第13页，刘志英，第8—9页。

²² 政府部门更喜欢三个交易所的创建而不是一个综合经营债券及有价证券的交易所，虞洽卿努力争取建立后者就像日本人的“取引所”。杨天石：《蒋中正先生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第160页。

²³ 《日本交易所将它的地址失给了中国的商人联合》，《中国新闻》，1920年1月1日；《中国人建立股票交易所：20年激动后交易所正式开业》，《中国新闻》，1920年2月3日。尽管日本人的交易所改变了位置，但是她一直开业到1922年它被迫清盘的时候。冯子明：《民元来之交易所》，第152页。

²⁴ 董显光，《关于上海股票商品交易所的争论》，《米勒氏评论》，1922年1月22日，第419页。根据三井的事宜，虞洽卿在与日本伙伴的早期谈判中是否脱身不是很清楚。

采恩—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²⁵两个交易所都在北京有其支持者，而后者又有能力迫使政府批准其成立，虽然这有违于在某一地区只准设立一家股票交易所的新法律规定。²⁶两个交易所都发行了他们自己的股票。正像刘志英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早期的上海交易所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三合一”：其成员既是建立者、股东，又是经纪人。²⁷

两家交易所很快就变成了摇钱树，其赢利额大大超出了创办人的期望。然而，这些初步收益也导致了竞争、模仿与投机。

“本所股涨价了，发财的，都想办交易所了……当时人心若狂，听说办交易所，就千方百计，辗转想法，来与购股票。股票到手就是钱财到手，各业风起云涌……就是没有业的凭空亦设交易所。好在那时没有交易法……”²⁸

到1921年夏天，对于证券交易的狂热弥漫了整个城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份大约有150家股票交易所和12家信托公司粉墨登场，他们都以疯狂的投机和大众的无知进行竞争。大多数新建机构仅仅是交易他们自己的股票。

零零碎碎的证据可以表明下列看法是有道理的，即这些新产生的经济机构很容易进入，它们也向社会上只拥有少量财产的那部分人开放。小数额的股票交易吸引着普通市民这类投资者，甚至包括妇女。至少有20家交易所在夜间营业，其中之一是位于大世界娱乐场的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这是为了吸引办公室职员从事股票交易而采取的一种手段。²⁹法国领事馆的文件对一个夜间股票交易所的场景进行了描述：为了将女士的珠宝变成现进行快速投资，当铺就设立在交易所的门前。³⁰随着泡沫的膨胀，投机把“妓女、演员、仆人和士兵熔于一炉了”。³¹

新建交易所在投资方面是容易进入的，但它们远不是透明的。根本不存在统一的规章制度或者说说明情况的义务。一小伙人在紧紧关着的大门进行暗地操纵，然后携款潜逃，根本不顾广大民众的利益。在争论中，甚至连内部的人员都不能看清楚真相，这一真相远不像杨天石所搜集到的关于陈果夫、蒋介石和张静江的投机活动的资料所揭示的那样明显。据说陈布雷也曾深陷股票市场而且损失惨重。

²⁵ 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第11-12页。[根据陈果夫的回忆，他和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之际开设了茂新号经纪所，但是将于他的浙江合伙人对此业都是外行，最初损失惨重后来逐渐盈利。蒋和张静江还开设了另一家恒泰号经纪所，但并不赚钱。陈果夫与蒋介石的往来信件表明征得款项都汇与孙中山，但是都没提供相关数目细节。] [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作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49，1964年，第156-158页。表明经纪人业务的目的是投机。]

²⁶ 奇良：《中国华商证券交易所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旧上海的交易所》，第39-42页。

²⁷ 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第12页。

²⁸ 俞寰澄：《民元来我国之证券交易》，《民国经济史》（上海，1947），第142页。

²⁹ 南特：《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Nante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上海领事文件》，A-59，1921年12月23日。

³⁰ 南特：《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上海领事文件》，A-59，1921年12月23日。

³¹ 关于社会最低阶级的提及出现在《信交狂潮之反动》，《银行周报》，1921年12月27日。冯子明（音译），第147页，提及到屠夫和小贩也卷入其中。

比起经济分析来，我对人们理解中国人交易所的方式更感兴趣。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运用新闻评论和连载小说来探讨主权意识与文化忠诚是怎样融入中国关于国家、现代化、道德和经济发展的争论之中的，而这一争论正是由上海的“股票交易热”刺激形成的。

对于日本人渗透的担忧和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的拥护

在历史上，当资金的抽象化和市场交换关系取代了以往更个人化的、更直接和更易于理解的习惯时，它们曾在不同的地区引起了对隐蔽的金融组织的忧虑，也引起了对遭受外来种族的、性别的和民族的团体侵染的担心，而这些团体往往被看作是可疑的、背叛性的、危险的和不体面的。³³在上海，由于对日本人殖民侵略计划的关注与日俱增，人们就对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忧虑。尽管五四抵制日货运动比较明确地将日本人的产品和公司（包括那些出售或生产日货的中国“奸商”）作为斗争目标，但是外国资本的个体性入侵仍很难被察觉到。毫无疑问，谣言是普遍的。新建的上海股票交易所行情会随着其对于外资操控侵染上海金融市场的恐惧而不断的起起伏伏。

因为中国交易所是作为一种抵制外国经济渗透的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北京政府便试图以捍卫国家经济主权名义控制不受约束的跨国资金的流动。中国的股票交易法禁止外国股东介入中国证券市场，也不允许中国交易所雇佣外国职员。³⁴

在民族主义高涨时期，中国民众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个新兴的把个体的和民族的认同性转变为普遍化的资本联合的市场机制不被外国势力所渗透。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关于外国势力操控本地中国股民的谣言就开始在中国媒体上流传开来。当交易所的股票几天内从12.5元上涨到70元的时候，《时报》笼而统之地报道说：“原因在于某个「外国人」的投机。大部分中国人一直在买进卖出，期望赚取一点点利润，他们想在价格达到100元左右的时候就把股票卖掉。然而，这个外国人突然停止买进了，导致价格在一天之内跌了20多点，中国人因为他的狡猾而被套住，损失惨重。”³⁵

随着价码、大众化和专门化规模的逐步升级，大众意象和个人交易的有利可

³² 杨天石：《陈布雷日记》。

³³ 在十八世纪的伦敦股票交易中，人们对与犹太人和苏格兰人也有着普遍的恐惧，因为他们由于投机和欺骗被认为是英国经济的破坏者。D. T. 安德鲁 (D. T. Andrew) 和 R. 麦克古文 (R. McGowen)：《派鲁斯 (Perreaus) 和鲁蒂夫人——18 世纪伦敦的伪造罪和出卖行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55-157 页。在对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股票交易所的研究中，V. E. 汤普森 (V. E. Thompson) 也在其作品中描述了一个女性旋入股票市场的漩涡的事情。V. E. 汤普森：《有道德的市场——1830—1870 年巴黎的男人和女人、金钱与政治》，(巴尔的摩和伦敦：霍普金森大学出版社，2000 年)。关于女人和中国交易所的情况可见顾德曼 (Bryna Goodman)：《非道德的交易所：民国早期股票市场的女性和腐败》，载罗梅君 (M. Leutner) 和 N. 斯帕克沃斯基 (N. Spakowski) 主编：《中国女性——历史透视中的民国时期》，2005 年，第 351—375 页。

³⁴ 《证券交易法》，1914 年 12 月 29 日，上海档案馆再版，《旧上海的交易所》，第 274—281 页。

³⁵ 《时报》，1920 年 8 月 15 日，这个帐目明显认可了中国人的投机，并可以断定中国人的投机比外国人要幼稚，缺少狡诈。

图性必然深受影响。上海第二家交易所名称中的前两个字“华商”意欲表明该交易所是属于中国人的，同时也暗示其竞争对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被日本资金所渗透的。³⁶关于一个神秘的日本专家“住在证券物品交易所内”的谣言无径自走，并称这位专家的能力是“无限的”。虞洽卿与大阪富士纺织会社经理之间协议的内容已经被日本政府否决了；这个会社希望在上海建立第二家日本交易所。虞的竞争对手声称大阪商人已经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换取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80%的股份。³⁷1920年11月初，有一封信刊登在上海一家发行量很大的英文报纸《中国新闻》上，该信抨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日资企业中华企业社有密切联系并认为该交易所通过在股东章程中只登列中国人姓名的方式来掩盖其拥有日本股东的现实。这一抨击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国人和上海的欧美人士面前颜面尽失。很快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也面临了相同的指控甚至是诉诸法律的威胁。例如，1920年11月18日，有一家中文报纸刊登报道说，上海原棉交易所的代表律师在发给中央政府和江苏省政府的电报中公开对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进行谴责，他认为这家交易所非法向日本人借款300万元，其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商人的利益。³⁸

尽管民族主义和对日本人卷入的揭露是大众讨论中的习惯性话题，但观察者也批评了中国人那种以爱国言辞加以论证的投机方式和腐败。³⁹管理跨国资金流动的实际问题、爱国主义对于建立新的交易的有利可图性、上海商人共同体内部派系的划分以及各派系在事件中对媒体的战略性利用等等，使有关交易所的议论更加热烈。据1921年1月《密勒氏评论》报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努力向大众证明该所是由中国人投资和管理的，是为中国人的福利而开办的。”而它的批评者，“正直的人[如张骞、H. Y. Moh]和上海华人商会主席C. C. Nieh则宣布它是由外国人投资并为外国人牟利服务的。”⁴⁰

论战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名声和经营受到损害。该所最初的经营对象包括“原棉、纱布、金银、谷类、油料和皮革”，但是因与日本人有联系而产生的猜忌日益增多，许多专营这些商品的商人遂从该所撤出了，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交易所。结果，股票和商品交易“几乎陷入崩溃”。⁴¹与此同时，信息的传播就像资金流动一样迅速，很快就传遍整个上海新闻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对手们从一家日本报纸得到了可以证明他们责难该交易所的证据。从日本《金融与经济》上减债的信息中，可以证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事实上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企业大部分的利润属于日本的中国贸易公司。”⁴²

在当时的小说中，中国证券市场那些肮脏的幕后交易勾当也受到了重复和讽

³⁶ 奇良：《中国华商证券交易所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旧上海的交易所》，第39页。

³⁷ 董显光：《关于上海股票商品交易所的争论》，第419页。

³⁸ 《时报》，1920年11月11日；《时报》，1920年11月18日；《上海时报》，1920年11月9日。这样的攻击并不像依据于事实的基础上。其建立后不久，就由于管理不善和投机造成了财政困难。这个问题通过像一名日本人（台湾人）借款得以解决。

³⁹ 引自《上海时报》，1920年11月9日。

⁴⁰ 董显光：《关于上海股票商品交易所的争论》，第418页。

⁴¹ 董显光：《关于上海股票商品交易所的争论》，第418页。

⁴² 董显光：《关于上海股票商品交易所的争论》，第420页。另一家日本人的期刊确认这家交易所是日本人的并把虞洽卿形容为日本人的傀儡，还指出“在反日情绪过去之后，日本人将向公众解释这个秘密”。

刺。1922—1923年连载于《星期》杂志上的江红蕉著社会小说《交易所现形记》就是其中之一。它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和股票市场打开了一扇窗口。⁴³

在小说中，交易所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尚未被人完全理解的事物出现于中国大地上的。小说的描写道，中国商人在看到自己无法与之竞争的日本上海取引所之后，就开始对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产生了兴趣。广东商人郁谦伯⁴⁴完全是为了赚钱才开办交易所的，但他却把自己的行为理性化为争取中国人自己的经济权益，捍卫国家主权。（第27页）因为他本人不懂交易所事务，所以他依靠一个日本熟人——一个被冠以不雅的姓氏“龟”的日本浪人——来设计这个新建的中国交易所。郁向中国合伙人隐瞒了龟与交易所的关系。但当龟不得不显身时，郁就给他起了个中国人名字并把他说成是一名留日回国的中国学生。郁创建的支那交易所利用爱国主义为幌子赚取利益。在声称中国人应该购买股票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观点的劝诱下，连本来对市场投资没有兴趣的中国人都开始购买股票了；股价开始大涨。（第37页）尽管交易所能灵活地操纵中国大众的投资，但最终也还是被谣言击溃了；《评言报》传播了揭露支那交易所从事外国证券交易活动的谣言。

正如小说所讽刺的那样，对于外国竞争以及外国资金渗透中国金融的恐惧造成了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发展，也造成了这些交易所的相互攻击。⁴⁵尽管对于日本人的担心在这部小说以及小说所讽刺的大众讨论中普遍存在，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两者如何取消对于这座城市半殖民地政治结构的分析，这种结构也为交易所的繁盛创造了基础架构。人们可以想象许多讨论早已由这座城市多国租界的作用预先决定了。

对于1921—1922年广泛传播的股票市场热来说，这座城市多重的政治权力属于一个根本因素，它们对各种有效的交易市场管理产生了结构性阻碍。一旦中国的交易所出现于世，中国股票交易的梦想者所难以预料的和中国政府所难以控制的恰恰是那些西方势力借以煽动中国交易狂热的方式，这就是这些西方势力在上海拥有治外法权，即使并非一贯有清醒意识。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根据中国的法律，在每个道级行政区划针对每一种产品只准一家交易所在政府部门登记营业。假如这一法规能够得到贯彻，那么它就会使上海限制于一家证券交易所，并且每一种商品也只能有一家交易行。⁴⁶然而，当意识到建立可以发行他们自己股票的交易所是一本万利的营生时，不少人马上就到外国领事馆注册建立起新的交易所了。乔治·索科夫斯基（George Sokolsky）在1921年底写道，“在外国领事馆的损害性注册”正是造成交易所建立过多的根本原因，它为交易所逃避中国的相关法律提供了便捷的“后门”。

⁴³ 这部比茅盾关于股票市场的经典小说《子夜》早了十年的小说，在汤哲生等小说《交易所真相的探秘者——江红蕉》（《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第七卷，南京出版社，1994）中再次出版。

⁴⁴ 实际上，早期的交易所受到浙江和江苏商人的控制。

⁴⁵ 尽管公众对于经济的评论颇多，但是小说中对于这个话题没有多少反映。也学因为它们缺少文化吸引力。关于经济的争论将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出现。

⁴⁶ 这并不能说明北京政府不能控制交易所的数量。正如上文提到的，相关部门同意上海成立违反法规的第二家证券交易所，这就表明一种因为政治派系斗争导致的腐败现象的存在。

⁴⁷1921年的一份关于上海交易所的英国报告表明只有十家声明是在中国政府部门注册的，四家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十六家声称是在法国领事馆登记的，十一家宣布是在西班牙领事馆注册的等等。⁴⁸

随着中国人办上海交易所的繁盛，不仅仅在上海，而且在天津、汉口、广州、宁波等其他的开放口岸，北京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来制止疯狂蔓延的态势。⁴⁹一封在11月初由中国外交部发给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函表明了政府的努力，也表明了其收效的微小。

“中国商业农业部以及北京和各省的各级管理部门与商会团体一再要求我外交部采取措施关闭那些有问题的交易所，因此我指示驻上海的外交专员与法国上海总领事商谈关于关闭这些机构的事宜。该专员告诉我说，法国总领事不想关闭这些交易所……这种事态发展下去将会造成很多个人的破产以及当地市场的动荡……如果贵方能指示贵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1) 与中国外交部专员通力合作关闭法租界内未授权的交易所，2) 尽可能快地废除法租界管理当局颁发的执照收费政策，我方将不胜感激。”⁵⁰

法国当局的让步不是关闭这些交易所，而是对这些交易所收费方法的改变。他们规定在法国领事馆登记的交易所每个月要固定缴纳100两白银，该费率的制定既满足了法国接受者的最大收益，又不至于导致交易所跑到别国租界避难。⁵¹中国外交部驻江苏的专员徐元（音译）和法国上海总领事威尔登（Wilden）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2月份时，徐注意到股票价格下跌已经导致了金融危机和自杀现象的出现，因此，他再一次请求威尔登关闭所有未经中国政府授权的交易所。⁵²月末，威尔登在致法国特命全权部长（Plenipotentiary Minister）德·弗里奥（de Fleuriau）的公函中提到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要求禁止所有交易所”。威尔登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的严肃性，并评论说，虽然中国政府颁布了相关政策，但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不停地要求对那些[特殊]交易所加以关照”。除了这些中国官僚非专业的和个人性的行为（它们一连同他所作的关于中国官员自己就为注册交易所要求5000两白银的贿赂的声明一起一自然减弱了中国政府要求的合法性）外，威尔登提出了“不能满足中国政府要求”的三点理由，每一个理由循着一种逻辑关系：

“首先，允许中国当局在我们已经拥有司法权的区域进行干预将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关闭未在北京注册的交易所……将会引起上海市场

⁴⁷ 索科尔斯基认为一些中国人购买股票是相信“如果有麻烦出现，他们将得到美国领事的保护。”他认为美国和其他领事没有因为外国人的荣誉等因素在股票市场危机中而出手帮助。“这可能因为怕被这样指责，在自己国家不允许的经济活动却允许在上海存在和发展。”G. 格拉玛达（G. Gramada）：《商品交易所的赌博》，《南华日报》，1921年12月6日。

⁴⁸ FO 228/3175。

⁴⁹ 刘、很多中国个人和组织也都抗议外国领事允许中国交易所在租借的注册。英国档案中有香港和上海银行买办的申请书。FO228/3175。

⁵⁰ 南特：《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上海领事文件》，A-59，1921年11月7日。

⁵¹ 南特：《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上海领事文件》，A-59，1921年12月25日。

⁵² 南特：《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上海领事文件》，A-59，1921年12月12日。

的恐慌，导致所有股票持有者即刻崩溃……我们将因此承担失败的责任，而这些失败最终也会被自身不变的经济法则所导致。可以推论……关闭交易所的决定会将大量的交易所拱手让予别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使其免受中国政府的监管。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领事馆也不幸地倾向于为这些不合中国规定的机构提供保护。鉴于以上理由最好不要过于探究此事。”⁵³

换句话说，与中国政府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破坏治外法权原则，破坏永恒的市场规律，更主要的是，在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明显地不同意合作的情况下，法国方面即使有最好的意愿也无能为力。

实际上，在管理交易所的事宜上，与其他国家的领事机构相比，法国作了更认真的努力。⁵⁴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921年秋天只有33家交易所在法租界开业；与之相对，有近100家交易所在公共租界开张营业。⁵⁵正如英国的报告所悲叹的那样，在国际租界，“由于分立的司法权利以及绝对行政权力的缺失，我们不能遵循好的模式行事。”除了组织上的障碍，英国和法国一样找到了思想意识上的理由来回绝中国的请求：“如果支持了中国政府那就相当于承认了公共租界有一种破坏自由贸易权利的存在。”最后，英国方面没有采取措施：“我们的观点是，这样一种相当于警察干预的政策将构成中国对租界内部事务的干涉。”⁵⁶

中国的观察者很容易发现治外法权在加剧股票交易投机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而作为帮凶的外国势力也使中国政府清理交易市场的努力功亏一篑。但是上海媒体对于中国反对外国租界的声明却持消极态度。因为中国的声明危及中国商人的权益，它们也使非大众化的北京政府取缔过多的非法交易所的努力合法化了。

对于北京政府取缔过多的交易所的努力，上海的《商报》——一份倡导对中流阶级 (middle-class) 进行政治动员的报纸——表现出极大的关注。⁵⁷其中有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可能出自陈布雷或者潘公展之手）以爱国主义词语反对政府的监管和治理，大肆宣扬中国“民众”（中国商人？）反抗专制政府的权力。

“今中央对于交易所已提出对外交涉矣。抑知上海交易所之成为交涉问题者，当始于撤销某国之取引所乎，乃他国人破坏我国权之取引所。既听其存在，而反于自国人设立之交易所，欲借以挽回国权，不益授人以口实乎。总之爱护国权，今日衮衮诸公且忘之，尤于民人何责焉”⁵⁸

另一篇社论更加激进，它论证说，既然中国农商部违反了它自己制定的交易所限令，那就表明这些中国法律本身是无效的。

⁵³ [威尔登写给弗里奥的公函,1921年12月19日]

⁵⁴ 除了月费，法国人还因为违法法规征收5元到1000元不等的罚金。FO228/3175，第一号。

⁵⁵ 南特：《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上海领事文件》，A-59，1921年12月19日。

⁵⁶ 弗莱瑟 (Fraser)，1922年1月31日，USDS 893.52/37。

⁵⁷ 《商报》是一家独立的报纸创立于五四运动时期。[陈布雷是总编辑，他本人当时也卷入市场投机之中（陈布雷回忆录）]。

⁵⁸ 《商报》，1921年8月11日。

“若以法律之目光论之，则国家至于今日，并未产生合法之交易所法，其有以命令制定，或以命令变更者，已缺法律之要件，当然无拘束商民之效力。即退一步言，今日官厅所称之法规，事实上不得不认为一种暂行条例。然此项条例，亦为官民所应共同遵守者，而农商部先自有所出入，商民之否认，尤何足责。”⁵⁹

邵力子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中撰文说，自由的市场竞争本身足以解决问题。

“官厅的调查、取缔，又能否有效呢，也者实是个疑问。中国人别的不能自由，只有弄钱的方法自由，环境又在与这种人以便宜。就使官厅真有心防范，尚且困难，何况未必是真心呢！我看这劫是没法避免的了。不过从又一方面看，却不必悲观。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或者反因此自行淘汰，促进经济改造的机运，也未可知啊。”⁶⁰

这些评论者（20世纪20年代初为工、商、金融界动员起来的阶级代言的当时或日后国民党的主要人物）认为只有通过中国商人、银行界以及公共团体的联合努力才能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他们拥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北京政府以维护国家主权名义阻碍国人牟利的行为持强烈反对态度。⁶¹他们的民族主义从战略上论证了当时正与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日本势力的渗透发生对抗的市场的正当性，但是当北京政府的政策将导致对中国股票交易所加以严格监管甚至是取缔时，国家主权就不是他们的争论的出发点了。

“经济学犯罪”：物质和道德价值的估算

最后的一段将进一步探讨有关“经济”这个跨语言概念的理解问题，而“经济”本身则是一个融汇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元素的词汇。⁶²但是在这里，我们将看到的不是经常与“殖民地现代性”相联系的、被假定为欧洲现代性符号标志的霸权，而是构成半殖民地交往区域文化特色的多重外来因素与本土因素的复合作用。经济这个词在19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具有多种含义及不确定性，它们包括了对科学的国家建设、财政计划和经济繁荣的期望，并被嫁接到中国古代的“经世济民”词语上了。

突如其来的经济振荡为新术语开启了有关贪婪的社会破坏性的文化保留。股票投机导致了对在深刻经济危机背景下遭到削弱的市场进行修辞学防卫的合法性。民族主义者经济发展的不可靠话语被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经济概念上。由交易所造成的社会恶梦与旧的对赢利的怀疑态度产生了共鸣。反对外来势力渗透、捍卫民族资本单一性的爱国主义行为提供了一种简易的、从旧的视资本主义为污

⁵⁹ 《商报》，1921年9月4日。

⁶⁰ 《没法避免的劫运》，《民国日报》，1921年7月24日。

⁶¹ 《经济事变与社会责任》，《商报》，1922年2月27日；《恐慌之防治》，《实事新报》，1921年8月13日。

⁶² “经济”是一个借用词，来源中国古代汉语。另一种翻译是，它包括了富国策，富国学等。见刘禾：《跨语际的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第268页，第315页，第360页。

物意识中分离出来的反殖民姿态。正是这种旧意识有力地指责了中国交易市场的过热。

紧跟着交易所泡沫破灭而迅速产生的对于这一经济崩溃的社会理解充满了道德情操内容。一份来自公共租界的中国承包人报告记录了 1921 年“蘑菇金融” (mushroom finance) 所造成损失和 1922 年 1 月大约三分之一的交易所的破产。当这座城市被投资狂热所笼罩时, 市区的房屋租金大幅上涨, 增幅达 20%。股票交易所的创办者携款逃跑。商人丧失了财富和企业。许多人被迫自杀。不少有前途的青年人误入歧途。⁶³在江红蕉的《交易所现形记》中, 对于交易所导致的破坏作用有这样的描述:

“这时市面上一百余家交易所同归于尽, 只剩三四家罢了, 也是风雨飘摇。……那些办事的所员, 有的弃了小学教员。弃了店伙, 都来投身, 没有半年, 那失事而返, 却变得奢华惯了, 闹了一批亏空, 再要谋旧事, 早已有人在那里, 不容回任, 真是坐吃山空, 噬脐莫及。独有一辈房主、木器店、水木作、漆匠、印刷店, 以及律师和他的翻译, 却捞了一大批, 但是也并不积了起来, 大都用到窑子里去。不过像金枝花、绮缘、红蕙馆一辈红倌人, 问问她们也说没有多一件首饰, 也没有积了些私房。可是上海的市面, 被交易所这样一扰乱, 已是凋敝得不少, 大非昔比了。正是: 一场浩劫化昙烟, 无人不说交易所。”⁶⁴

在读了上海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些杂文后, 我意识到现代的“经济”术语已经变成了旧文化含义的一个载体; 这些杂文讲述了一位在 1921 年股票狂热中失去所有积蓄并因此而自杀的妇女的故事。⁶⁵在描写这个故事时, 上海先锋派导演郑正秋愤怒地责问究竟谁应该受到谴责。通过调查股票市场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 郑认为谴责席女士因为“投机而死”是不公平的,⁶⁶与当时其他一些人一样, 郑断言犯罪早就发生了, 席同其他一些由股票市场导致的自杀者一样, 也是不知情的牺牲品。犯罪的一方是一种抽象: “这是谁的罪恶? 不是经济的罪恶是什么?”⁶⁷

郑的质问揭示了一种负面的文化联系, 它依附于股票交易所这个新兴资本主义机构以及在 1920—1921 年间横扫上海的投机性投资热潮。⁶⁸当时的股票市场指南、经济报告、交易所图表展示和有关股票市场的早期小说都证实了利益相关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意义的战略虚构。这一工作对于反对当时广泛存在的、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道德保守和位于欧洲模式现代性观念之下的关于财富不断增

⁶³ 《上海的股票和商品交易所》, 《中国工程师和承包人公告》(1922 年 1 月增订版), 美国档案部, 893.52/37。

⁶⁴ 江红蕉:《交易所现形记》, 重印于汤哲生《交易所这项的探秘者—江红蕉》, 《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 第七卷,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4), 第 158 页。

⁶⁵ 这件事详见顾德曼:《新女性的自杀—报刊、文化记忆和新共和国》, 《亚洲研究》, (2005 年 2 月)。

⁶⁶ 崔蔚茹:《席上珍》, (上海妇女职业研究社), 1922 年, 第一部分, 第 8—9 页。

⁶⁷ 崔蔚茹:《席上珍》, 第一部分, 第 10 页。

⁶⁸ 我在别的地方考察了股票交易市场中的女性活动, 见顾德曼:《非道德的交易所: 民国早期股票市场的女性和腐败》, 载罗梅君 (M. Leutner) 和 N. 斯帕克沃斯基 (N. Spakowski) 主编:《中国女性—历史透视中的民国时期》, 2005 年, 第 351—375 页。

长的想象是必要的。

经济的现代性和“虚业”问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半殖民地的上海，中国股票交易的建立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事业，民族主义也从文化上证明了企业不确定因素的合法性。加入竞争性全球秩序的民族资本主义梦想使中国的改革者和商人能自由地拥护传统上不被认同的牟利思想。中国经济现代化新道德的倡导者认为，通过增强中国的工商业可以使中国挑战它所面对的世界列强的殖民化欲望。1921年，上海的一份指南曾对建立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必要性作了如下解说：

“寰球交通，竞争日烈。兵战而外，兼以商战。顾兵战为有形的、一时的，而商战为无形的、永久的。且兵战仅恃武力充足，而商战全赖实业发展，此一定之理也。夫欲发展实业，非有伟大之实力，雄厚之资本，并组织有秩序有统系之经济机关，以维护而启导之不为功。是交易所之设立，在今世界所断不容或缓者也。盖交易所者，为商业上一种保证信托之特殊机关，所以平准物价，调剂供求，指导投资者之方向，减少商业上之危险。此种机关之产生，视国民经济能力发展迟早为转移。近世潮流急进，商情实业，愈趋愈扰杂，其危险之机四伏，决非小企业小资本家者所能窥测而运用，于是不得不藉伟大之经济机关，以为之辅翼，为之维持，作投资者之向导，保持金融上之平和，俾投资事业，渐趋于稳健地位。由此观之，交易所一业，实为经济界工商界金融界上不可或缺之一种机关也。”⁶⁹

正如引文所谈到的那样，股票交易所的拥护者们阐述了一种和谐的和受到保护的市场的思想，一种对于个人谋利和投机等麻烦问题未有任何顾虑的幻景。⁷⁰在这样的指引和评论下，股票交易便以为大众和民族谋福利的机构身份开始出现了。⁷¹

这样的幻景只能通过抹掉早期的赚钱概念才能得以持续。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商业报纸所展示的中国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浪漫文学正是建立在有关信用丧尽的中国的过去观点之上的。这是一个被一系列“传统的”性格缺陷和文化虚弱搞垮了的过去。要重建中国文化、增强民族的力量，必须首先根除这些缺陷，结束帝国主义羞辱的梦魇。在这些缺陷中，腐朽堕落的消遣活动，特别是逛妓院和赌博占有突出地位。这些行为只是沉迷酒色的表现，对于国家经济的建设毫无用处。

⁶⁹ 王恩良：《交易所大全》（上海：交易所员暑期养成所，1921年），第3页。

⁷⁰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范畴中，缺少对于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支持者。即使在上海的商人阶级中也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将会损害集体利益。上海交易市场的推动者关于市场的描述可以和 A. J. 休斯（A. J. Hughes）的演讲内容相对照：交易所不仅仅只是“历史发展车轮的一个零件”而是对于社会福利部可获取的重要部分。休斯先生作出了一个关于个人动机的社会价值以及中国交易所很难成立的断言。《休斯先生关于股票市场是社会发展促进因素的演讲》，《上海市报》，1920年11月30日。

⁷¹ 自私的动机不是良好股票市场的一部分，尽管当上海的股票市场走向歧路时贪婪的商人成为公众批评的靶子。

报刊社论连续不断地攻击彩票并号召取缔各种赌博活动。⁷²

经济的现代主义者反对赌博，因为它浪费了发展民族经济所必需的资源。对于建立股票市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在市场充斥着投机的背景下，大众把股票交易与赌博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为股票市场的推动者制造了与道德相关的问题，而这些推动者正是赌博的反对者和股票交易所的鼓吹者。与道德有关的概念产生于媒体制造的股票与赌博的类比。例如上海《商报》中的一篇文章是这样阐述的：

“失望者遂至公然指斥交易所为有害于社会之投机事业，而谋所以废止之。其实投机之一名词，用意非一。一般社会所视为毒蛇猛兽之投机，与学术上之所谓投机，决非一物。谓交易所为提倡投机事业，即交易所之自身亦当是认之，但若比此类投机于赌博，而武断的指为如何有害于社会，则不独有看朱成碧之嫌，亦不啻自证其不学无术。……投机与赌博，世人多不能名辩其异同。就表面视之，两者俱以博未来之利益。……赌博者，除道德上之损失外，于社会无利亦无害，甲失乙得而已。而投机不然，依契约者才智之不同，或增加财产，或减少财产，此根本的区别也。但吾以为赌博者，不特在道德上有损失，即在社会上亦非无损失。……而真诚之投机则不然。真实之投机，一商业行为耳，虽不能无减少财产之虞，然决无若从事赌博者之危险也，且其事非损人利己之行为，于道德上亦无损失。……可悟投机与赌博之截然为二物而不可合并。况乎投机事业，形式上虽似祇有个人之利益，而实能增加国民经济之活力，因为现代经济组织下所不可缺之要素耶。”⁷³

那些批评股票市场的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的人自然会将它与赌博加以比较，并将它称为“虚业”，空的或无实际意义的产业，甚或是“骗人的买卖”。关于市场投机的中国词汇如“买空卖空”就揭示了这些行为的无实际意义性。1921年7月初，《上海总商会期刊》刊登了一篇题为《股票市场的优缺点》的文章，断言中国股票交易所是对中国面对全球经济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作出的一种错误反应。在作者看来，一战期间中国经济的短暂繁荣被战后的萧条所打断，这就导致中国商人“群趋交易所，作孤注之一掷。”但是这一冒险行为的结果很快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死者死，逃者逃，变产质衣者，踵趾相接，于是有识者，皇皇然相告曰，交易所即大赌场也。”⁷⁴随着市场投机性的日益显露，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它与赌博相提并论了，报道自杀事件的作品充斥于市。⁷⁵

为股票市场辩护的人们则需要做以下两件事情：一是用可为发展带来广泛机会的光明一面取代可导致全球不平等的灰暗一面；二是用股票市场理性的、生产性的和现代性的特征对抗赌博的非理性和挥霍浪费性特征。报纸中有关这个话题的争论的经济和道德策略尚需等待检测。

⁷² 《实事新报》，《中华新报》，《申报》中相关的例子出现在1919年11月15日和1921年2月15日的《上海时报》；可见《漕河泾商人请严禁赌博》，《商报》，1922年4月3日。鲁迅的经典作品《阿Q正传》中讽刺了主人公赌博的恶习以及因此受到的欺骗。当像鲁迅义演的文化批评家声讨赌博时，中国的改革者通过了法律以根除城市中的赌博行为。

⁷³ 《交易所与投机事业》，《商报》，1921年2月22日。

⁷⁴ 《论交易所之利弊》，《上海总商会月报》，1921年7月，第1-2页。

⁷⁵ 《晶报》，1921年6月17日，6月18日，8月9日，8月27日；1922年7月30日。

发生在股票市场的批评者与拥护者之间的争论在反对交易所的《实事新报》和支持交易所的《商报》上充分展开，而《商报》自股票交易所建立伊始就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后来，尽管上海的股票交易所在各方面已经失真，它至少仍在原则上保留着信心。这次讨论之所以被大幅引用，主要因为作者为对抗根据旧道德经济提出的批评展示了一种普遍经济进步话语。

“时贤以其非生产的也，创为虚业之说以示裁抑。……”

经济上之所谓生产，其义非指造物而为造财，故凡能增加财之效用者，……均可名之曰生产。其利用天然以培植原料者，固为生产，而变更原料之形体，或变更其地位以至于变更其时日者，盖无往而非生产。换言之，亦即无往而非世之所谓实业也。夫企业之本质，所以增加财之效用，而藉以充足世人较大的欲望。是故一切企业，皆具生产之效能，以其皆具生产之效能，故以经济之全体言，实业虚业，其剖晰颇属难能。……

且即退一步言，姑认农业以外之企业，或农工业以外之企业为不生产的企业，因以此等事实为虚业，然此种虚业之影响于社会经济者，其为利为害，要亦应时应地而异，而未可悉加以裁抑也。例如金融业，明明非农工的企业也，然其流通资金，利用游资，以酌盈剂虚而助他业之活动者，其造福于经济社会，未必在农工业下。……

抑又有进者，今之所谓虚业，吾人即认其为不当，而实业亦未必尽利也。例如生产过剩，常足以形成信用之破裂，与经济之恐慌。……本以增加财之效用为职责，以经济之全体言，本无实业虚业之分别，尤抑此扬彼之余地。”⁷⁶

《实事新报》对于《商报》论点的回应不是反驳其论证的逻辑，而是对在中国建立交易所的必要性和隐蔽在其建立之后的动机提出了疑问：

“陡然设立这样许多交易所能不能成为疑问？至于信托公司呢，也要看看现在社会上是不是有大宗过剩的资金，再要看看社会上对于公司事业信用的程度如何。……”

再就中国的需要上来看到底何种实业是最需要的。以现在外货充斥，日用品都仰恃于人的时候，恐怕没有谁能否认发展农工事业比发展商业更为需要……那么，在中国与其以资本来办调济物价之交易所，及设立吸收余资之信托公司，那就不如把这宗大资本来开设工厂，改良农业，效用更要大一些。……况且事实上，现在的交易所及信托公司，其能以真实营业为目的者有几家。……大多数是以抬高股票价格以图获利为目的。”⁷⁷

《商报》的作者通过找出其对手的经济理论错误进行还击，坚决主张科学

⁷⁶ 《我的“虚业”观》，《商报》，1921年8月11日。

⁷⁷ 《我的“虚业”观》，《实事新报》，1921年8月15日。

与股票市场的紧密联系。⁷⁸《实事新报》的编辑则用道德和自杀现象来反驳上述科学论。

“交易所及信托公司，无论在学理上有如何的效能，然我总以为在中国现状下实不相宜。……现在有了这样许多交易所和及信托公司了，我之见他们已经造出许多罪恶，不见于经济社会上有何种裨益。如因投机失败而潜逃自杀也是有的。……其中暗受损失者不知若干人。听说他们发起人中有些在当时风头好的时候，抬高卖出，现在因为风头已过，社会上不信任了，于是便压价收进。这一卖一收，他们已经赚了不少，而吃亏的人竟不知有多少。”⁷⁹

道德变成了大众讨论的主要话题，同时也为人们理解股票市场提供了主要框架。我在这里引用《商报》和《实事新报》之间的争论是为我们了解当时公众对于经济的理解和评价提供一个窗口。这次争论表明了对于经济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把“经济”视为国家层次的复杂体系，而另一种则是从个人行为 and 道德方面来看问题。着重于道德问题的，除了讨论经济事务的专业出版物，还有诸如《上海总商会期刊》等杂志。正如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股票市场的对与错》一文的作者所哀叹的那样，“我国年来，商业渐兴，消息亦较前灵动，交易所亦逐渐增多，然商业道德，反因之而薄弱”。⁸⁰

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江红蕉的社会小说是值得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揭露市场的贪婪、腐败和不道德的小说 (exposé) 来读。小说中，交易所—像帝国晚期的财神五通一样—试图使那些良家妇女误入歧途。⁸¹就像吴彤利用金饰物这样的小恩小惠来迷惑少女一样，股票市场不但拿走了那些本来应当是它给与的东西而且毁灭了那些被它勾引到手的受害者。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这一段描写，它以死亡和毁灭的全景式概括凸现了一个人的自杀而亡。

“别家交易所没有女人做买卖，独有半夜交易所，有许多女人在里面。投机买卖，女人那里懂得其中奥妙，只知道价高了便买进，瞧见价跌了，忙又卖出，自然蚀的居多，赚的居少。最可惨的，便是西医潘笏臣的妻子……他瞧见本所股日涨夜大，他就托人去买了一百股，四天之内，便赚了七百多元……谁知一个月以后，忽然大跌……他的血本也去了一大半。他还不死心，要待价格回涨，不肯割舍，追证增证，总是照数解出去……他见大势已去，只得忍痛割卖，谁知他才卖掉，价钱忽大涨起来了。他更限红得了不得，便又去设法借凑了一笔钱，买了二百股，果然每股涨了三元，他想再看看风头，让它涨足了再卖不迟，可以稍稍捞还些以前的损失。谁知隔了一天，有四个经纪人，在场上大抛空头……不到两个月，前后蚀去了一万七千余元。起初是瞒着丈夫的，后来被丈夫知道了，他想如何搪塞得过去呢，便又奔到半夜交易所去，躲在一处黑暗之所，待夜里十二点钟收市了以后，人都散了，他才蹑手蹑脚到市

⁷⁸ 《我的“虚业”观，二》，《商报》，1921年8月16日。

⁷⁹ 《为交易所及信托公司问题答养初君》，《实事新报》，1921年8月17日。

⁸⁰ 《论交易所利弊》，第一页。

⁸¹ 关于吴彤 (音译)，看 VON GLAHN，《罪恶之路》，第242—246页。真实生活中，男人在市场中作为受害者的数目远多于女人。但是在小说中描写女性受害者自杀效果更显突出。看顾德曼：《非道德的交易所》。

场上来，解下一条汗巾，紧在经纪人所立的栏杆上缢了。”⁸²

陆守险以同样的风格写作了小说《失败妇女之投缢》。小说暗示女人是那些操控市场的经纪人的一个天然目标，因为他们知道“妇女之钱，易以利诱。”故事讲述了一个股票经纪人利用经济利益诱惑一位不谨慎的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的丈夫经常在汉口做生意，没有发现她的秘密以及她最后的损失与经纪人发生的灾难性经济联系。小说完全从妇女与经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角度，描绘了妇女投身投机市场的非个人性经济后果。“非独衣饰已一空如洗，即向人借贷之款，早晚追索不容少缓，不得已，经纪人催迫于胡女，胡女反乞憐于经纪人。”胡女士绝望了，她去找交易所的董事长并屈辱的跪在他的面前。虽然这个虚构的胡女士在性方面不是随便的人，但她的债务问题还是不得不通过背叛丈夫的方式加以解决。

83

在这些道德故事中，股票市场成了玷污道德的代表。那些被诱惑的人很快从道德堕落纵向了自我毁灭。所有的一切发生的很快，就像新交易所“所有贵金白银，尽变数页字纸”并且最后使之变成“废纸”一样迅速。⁸⁴

假如说股票市场最初是在那些与现代化和民族经济强大相关的宏大话语中得到了支持和欢呼的，那么 1921—1922 年的危机很快就以一种有关死亡、毁灭和女性自杀的画面取代了经济上的期望。报纸上的漫画也从一种温和的文化矛盾心理转移到了预示着危险、死亡，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影像。（在 1921 年 8 月份《申报》上出现的）两幅漫画展现了对于现代新交易所的惊叹。画面 1 是《上海市之今昔观》，城市中突然出现的交易所被描绘为高大的西方建筑并使得它周围的事物毫无价值可言。⁸⁵画面 2 显示了一种更大的社会矛盾情绪（即使缺少幽默意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两幢建筑，一幢的入口处是空的，而在另一幢的门口则挤满了人。第一幢建筑的门口有一个标记说明很多人参加了大学考试但只有少数人被录取。标题上写道“有志不成者不知几何人”第二幢建筑是股票交易所，很明显里面有很多的学生。其标题为“流入此中者又不知几何人”漫画显示了股票交易所的流行性和容易进入性，也表明很多没有考进大学的人拥满了交易所从事交易。⁸⁶

更多的漫画阐述了股票市场对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危害。画面 3 描绘了一个穿着校服的盲学生正在通过一个铺满鹅卵石的小路，小路上标有“股票交易所，信托”的字样。⁸⁷画面 4《旋入漩涡》则展现了一群青年人（标有小学老师的字样）被卷入漩涡（代表股票交易所），他们的手高举着就像在交易所中喊价一样。⁸⁸主题变成了自杀和毁灭。画面 5 描绘了破产的交易所和信用公司以及一些正在跳崖

⁸² 江红蕉：《交易所现形记》第 155—156 页。

⁸³ 陆守险：《交易所现形记》，（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 1922），第 41-42 页，这本书与江红蕉的小说同名。

⁸⁴ 陆守险：《交易所现形记》，第 54 页，第 74 页。

⁸⁵ 《申报》，1921 年 8 月 23 日，漫画《昔》描画了一个厕所，幽默的预示着交易所是在大便满地的地方建立的（另一种解释，预示着其以大便为基础）。

⁸⁶ 《申报》，1921 年 8 月 19 日。

⁸⁷ 《晶报》，1922 年 7 月 30 日。

⁸⁸ 《申报》，1921 年 9 月 17 日。

的人物。⁸⁹画面 6《交易所造孽》描绘了席商珍自杀事件的画面。席的头盖骨被描绘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品陈列室”的最后一件附加品。⁹⁰陆守险写作的关于股票交易所的讽刺作品《交易所现形记》也在封皮上印有很多的骷髅。⁹¹

自杀、罪犯和文化救赎

人们可以这样解释股票市场与自杀事件之间的联系，即认为这是一种对于经济灾难和由这一灾难造成的自杀的简单反映。关于当时上海发生自杀事件的实际情况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因此我们不能从经验上回答这个问题。⁹²然而，在梳理了当时报纸对于席商珍和席商珍以外的其他有关股票市场自杀事件（找到了一些，但不是很多）的相关报道后，我认为集中于文字上的自杀事件不足以说明在上海民众中广泛传播的对自杀事件的理解和股票市场的逐渐消失问题。一些外国观察者认为自杀事件被夸大了。有一份关于这次市场崩溃的英国人报告总结道：当时的情况的确造成了严重破坏，“然而其破坏程度很容易被夸大。尽管中国媒体不断地报道相关事件……但这些报道是靠不住的只能被看作是公众观点的一个索引而已。”⁹³

对于那些股票交易所的反对者来说，破产投资者的自杀现象为这些机构的罪恶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自杀是道德真理产生的舞台。从市场崩溃后的大量评论来看，人们不能期望被一种普遍利益的缺席所打动，它或者是以经济分析的方式讨论什么东西出错了，或者援引政治分析，把该城市的半殖民地结构或中国在全球强权关系中的地位都考虑在内。相反，人们主要是从道德方面来理解股票市场的，这种道德既不与资本主义相契合，也不懂得系统的经济语言或阶级分析。就这一点而言，与十年之后的股票市场分析或在 1933 年茅盾小说《子夜》中有关股票市场的著名描述相比，民国初期对于股票市场的讨论与早期的对于商业社会的文化批判更能产生共鸣。

假如说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经济理解中发现早期的金钱观念并不令人十分吃惊的话，我们也必须注意 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上海民众并没有完全将吴彤这个老魔鬼定义为罪犯。对于那些不认为自杀者要自负责任的人来说，除了经济学的抽象概念和股票交易所罪恶的运行机制外，还有另外两个罪犯需要予以关注。

其中之一，正如从早期民族主义者早期讨论中看到的恐惧那样，是那些令人怀疑的外国人，他们通过无形的资金流通渗透和操纵了中国经济。但是，鉴于上海没有被完全殖民地化，中国人又拥护市场并通过在外国租界注册来躲避中国政府管辖的情况，确定和查找一个国内的罪犯是必要的。大众普遍认为这个罪犯就是中国商人。1921—1922 年的市场崩溃使商人共同体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因为它

⁸⁹ 《申报》，1921 年 9 月 18 日。

⁹⁰ 《晶报》，1922 年 9 月 18 日。

⁹¹ 陆守险：《交易所现形记》。

⁹² 上海在 1928 年前没有关于自杀事件的数据统计。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统计》（上海，1933 年）。

⁹³ USDS89.52/37，弗莱瑟 1922 年 1 月报道。

推动了破坏性的交易市场。⁹⁴日报中的散文和诗歌也一致“咒骂这些创办股票交易所的毒蛇”，⁹⁵谴责那些应为股票市场崩溃负责的“良心败坏的商人”。⁹⁶在这些谴责中商人们被比喻为“大腹便便”、“披着人皮的恶魔”。⁹⁷

尽管报纸的读者和学者们选择了他们中意的罪犯，关注自杀行为的最吸引人特点仍然与下列情况密切联系，这就是对于自杀的文化理解有助于显示，这种理解用欺骗的安全代替了变质的美德。假如大多数上海人贫穷的不能在股票市场上投资，那么如此多保守的中国家庭屈从于市场的诱惑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由1921年市场投机造成的必然的市场崩溃引发了中国人关于道德丧失问题的深思。如果说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曾经是一种相比于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而言的文化优越性的安全资源的话，那么那些无辜的自杀者形象大概就是一种揭示覆盖在所发生事件之上的文化罪恶的手段。

结论：关于“交往区域”的反省

在这篇论文中我把半殖民地的交往区域看作是这样一种手段，它突出说明了塑造上海早期股票市场经历的多重不平等权力机构和思想文化的作用。假如我必须为我的论文过长进行辩护的话，我的理由就是重要的细节可以使人们对于泛泛而谈的殖民主义，对于所谓的殖民与反殖民的区分，对于一个过于概括的“殖民地现代化”理论获得更深刻的认识。而上述的三个方面模糊了“殖民者”多样的和复杂的实际行动，也模糊了舶来品现代性的当地代理人的身份，模糊了现代性在当地的含义及其重新工作情况。在这里我试图突出地域的复杂性—半殖民主义借以提供多重模式的方式、竞争的和相互限制的殖民权威（即使这些权威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含混不清的身份认同（实际是日本人的台湾投资者）和跨民族的资金流动（革命筹款）等等。我也试图突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和语言在当地环境中所需要得到的合法性，突出半殖民主义的内部冲击、全球规则的形成以及报纸宣传在各种语言中的状况，而这些语言为支持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平台。

（译者：孙立新、徐振江）

作者简介：

顾德曼 (Bryna Goodman)，美国俄勒冈州大学历史学教授，专攻中国近现代史。

译者简介：

孙立新，中国海洋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⁹⁴ 在市场崩溃后出现了大量的法律诉讼事件，每一件都会证实令人吃惊的商业行为。上海的商会在被法庭传唤和提交证词时，语言谨慎。相关事宜可见上海商会档案。上海商会档案—工商联档案，200—1—008（1922年）。

⁹⁵ 《实事新报》，1922年9月18日。

⁹⁶ 崔蔚茹：《席上珍》，第一部分，第16页。

⁹⁷ 《时报》，1922年10月14日，16日，18日，19日。

徐振江，中国海洋大学“历史地理学”硕士点 2006 级研究生。